

人文國際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第8輯

历史学专辑

主 编 周 宁
执行主编 盛 嘉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 社址 ——

100000 北京

宣武门大街 1 号

人文国际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 第8辑 -----

历史学专辑

主 编 周 宁
执行主编 盛 嘉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学术交流项目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国际. 第8辑/周宁, 盛嘉主编.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615-5172-1

I. ①人… II. ①周…②盛… III. ①人文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4231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75 插页: 1

字数: 429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营销中心调换

本刊宗旨

《人文国际》(*Humanities International*)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创办的一份综合性的国际人文学学术丛刊。本刊的宗旨是推动在新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的人文学的国际交流与发展。本刊将刊登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科领域中的专家和学者视野广阔、观念新颖的各类学术文章。本刊试图实现两种跨越与交流:一是跨越国家地理的疆界,通过搭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二是跨越不同人文学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了解、互动与渗透。同时,本刊也将努力寻求地方性文化与学术全球化之间的平衡,推动中国学术的国际化 and 多元化。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目 录

本刊宗旨

历史学专辑

1	侯旭东 罗新 程美宝 陆扬 等	历史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路径 ——围绕出土行政文书、族群、地域文化与新政治史研究的讨论
32	张侃 朱新屋	“正统”的层累及流动 ——唐宋闽北地方神欧阳祐考论
51	温春来	五族共和之外 ——整理民国时期彝族精英分子所写汉文文献的思考
60	[日]岸本美绪 陈永福 译	“时代区分论”的近况(1980—2000)
72	[日]金坂清则 钟 翀 译	我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在世界人文地理学的潮流之中
82	鲁西奇	空间与历史: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

实验知识论

98	曹剑波 李峰峰	葛梯尔案例的实验知识论研究
108	郑伟平 洪雅如	Know-how 中存在葛梯尔型反例吗
122	魏燕侠	葛梯尔型反例是不可避免的
131	陈 增	先验建构:论胡塞尔的先天知识
139	郑辉军	刘易斯论给予
148	万超前	《实验哲学》评介
150	郑伟平 魏燕侠 杨修志	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化 ——访台湾东吴大学米建国教授

通识教育

- | | | |
|-----|--------|------------------|
| 162 | 刘佳辰 | “跨界·对话”与厦门大学通识教育 |
| 165 | 周宁 李晓红 | 跨界·对话:去哈佛学课 |

知识分子论

- | | | |
|-----|----|---------------------------------------|
| 179 | 李琦 | 反观性、超越性、自我放逐、非交换性
——关于知识分子特质的重述与阐发 |
| 198 | 谢泳 | 陈寅恪晚年诗中的人事 |

美国研究

- | | | |
|-----|-----|---------------|
| 209 | 盛嘉 | 重新认识美国革命的历史 |
| 222 | 夏光武 | 六十年来台湾的美国文学研究 |

中国电影

- | | | |
|-----|-----|----------------------------|
| 231 | 王晓平 | 表征底层的两种方法:以《巫山云雨》和《三峡好人》为例 |
| 247 | 孙红梅 | 西游记的穿越
——中国猴王与美国屏幕 |

地方历史文化与人物

- | | | |
|-----|-----------------------------------|------------------------------|
| 260 | [波兰] Andrzej Juchniewicz
(尤德良) | 中国文学在启蒙时代的荷兰 |
| 271 | 郑启五 | 《枫野集》中的厦大往事 |
| 281 | 詹朝霞 | 以《江声报》为视点观察 1949 年前的厦鼓轮渡创办经过 |

综述与报道

- | | | |
|-----|-----------------|---------------------------|
| 289 | 戴美玲 | “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国际学术论坛在厦门大学举办 |
| 292 | 青年学术沙龙
龙管理小组 |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术沙龙 2013 年活动综述 |

人文国际讲坛

- | | | |
|-----|--------|--|
| 297 | 戴美玲 整理 |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文国际讲坛”(2013 年 5 月—2013 年 10 月) |
|-----|--------|--|

《人文国际》诚挚征稿

历史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路径

——围绕出土行政文书、族群、地域文化与新政治史研究的讨论

侯旭东 罗新 程美宝 陆扬 等*

引言

近年来,在历史学研究领域,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学者已逐步成长起来,出现了一批在各研究领域取得引人注目之成果、并在问题意识与思想方法各方面均颇有创见的学人,其总体特征是视野开阔,既对中国学术传统有较好的继承与发扬,也对西方学术前沿及其思想方法有较好的了解与把握,因而其问题意识明确,大都试图摸索会通东西方学术、贯通中国历史之不同时段与不同领域,进而探究中国历史发展之总体特征及其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意义的可行性路径,并努力将纯粹的学术研究与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某些受到相对普遍之关注的研究方向或论题,如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人群(诸如族群、民族及其他社会人群)的划分、界定及其意义,信仰与仪式及其意义,国家建构及其权力的形成和结构,地域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过程,等,初步摸索出一些立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将人类学、社会学及跨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路径,并将之运用到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从而在历史研究领域显示出某些生机勃勃的新动向,且渐具引领学术发展的潜力。

基于以上认识,自2011年以来,我们即筹划组织一次小规模学术研讨会。经过较长时间的沟通与协商,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的支持下,研讨会于2012年11月24、25日在厦门鼓浪屿召开。参加会议的学者共16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罗新、陆扬)、清华大学(侯旭东)、中山大学(程美宝、温春来、谢湜)、浙江大学(吴铮强、杜正贞)、武汉大学(魏斌)、四川大学(王献华)与厦门大学(鲁西奇、盛嘉、刘永华、张侃、饶伟新、黄向春)。

此次研讨会试图改变现今历史学术会议的通常做法,让从事不同断代、不同专门领域,甚至是不同国别历史的学者坐在一起,比较深入地谈点想法,不仅是交换学术信息,更是理解、领会各自的学术理路,互相启发,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参加研讨会的学者的学术领域,跨越了中国中古史、明清史、近代史以及世界上古史、美国史等领域。我们希望以后

*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
程美宝: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陆扬: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

有更多研究领域的学者参与。在会议形式上,我们没有采用学术会议通行的学者轮流报告、评议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主题报告、然后围绕主题报告展开较深入讨论的方式。我们理想中的讨论方式,应当是取消报告,由领言人直接主导议题,展开自由讨论,但这次研讨会我们还不尝试这种方式。

在这次研讨会上,侯旭东、罗新、程美宝、陆扬分别做了题为“出土行政文书简牍的研究方法反思”、“族群过程与行政区划”、“研究地域文化的两个视角”、“为什么需要政治史——以唐五代为例”的报告,与会学者围绕着这四个论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我们把这四个专题的报告与讨论整理出来,形成这篇纪要。张侃、王献华、温春来则分别以“流动的‘正统’:闽北欧阳祐崇拜考论”、“作为地理概念的苏美尔”、“五祖共和之外——整理民国时期彝族精英分子所写汉文文献的思考”为题,做了学术报告,并提交了论文,与会学者也分别围绕这三个专题报告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我们把这三篇论文单独列在后面,并将与会学者的讨论纪要分别列于各篇论文之后,以便读者了解各位学者的论点。除了这三篇论文由作者直接提供原稿之外,其他部分均先由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张锡臻、王小蓉整理出初稿,鲁西奇据录音校对补充,呈给各位参会学者校定修改,然后再由鲁西奇编排。

一、出土行政文书简牍的研究方法反思

罗新(主持人):这几年,年轻一代的学者开始自觉了,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些什么特殊的使命,有很多会议开始召集年轻一点的学者参加。在座的侯旭东、刘永华,我们前几年参加过《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那时候我们还比现在年轻一些。但那个会上,主办方没有忘记一点,即找一批实际年纪并不大、但把自己看得很大的学者参加,他们自己当作长辈,教训年轻一代的人,但毕竟出现了一批稍微年轻的学者。近年来有很多这种活动,这次会议就是众多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上海有家出版社还在出版“60学人文丛”。学术发展可能到了一个新的更新换代的时候。由77、78级为主的学者主导的改革开放以后的学术研究,也到了一个需要改变的阶段。看得出来,新一代学者的自觉意识已经觉醒。

第一场讨论的报告人是侯旭东教授。侯旭东教授近年来的学术路程,在从事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学者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般被认为是最引领中古史研究潮流的学者。近年来,他很大的精力,在做出土文献,从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古史,包括中古社会、中古政治以及中古的制度等。他今天所做的报告,题目是“出土行政文书简牍的研究方法反思”。

侯旭东(报告人):出土行政文书简牍的研究方法反思

最近这些年,我在做出土文献方面的研究,有些想法,在这里提出来,和各位交流、讨论。在座的不少老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好多都有下田野的长期经历和积累。提倡走向田野、走向历史现场,这对中古史学者也很有吸引力。但是,中古史的田野与明清史的田野有很大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出土资料经过辨析使用,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田野,成为我们的历史现场。出土的文献有时候比传世的文献更贴近当时的时代,当然有些是有意保存下来的,有些是无意中留下来的。出土文献可以向我们展示很多史家不一定想让我们了解的东西,或者他们有意无意地遗忘的东西。

1. 简牍研究的冷热变化

简牍研究冷热变化,从1996年我工作时讲起,经历了一个从冷到热、热中有冷、冷热不均的变化历程。90年代中期,我去社科院历史所工作,那时候我们研究室的主任是谢桂华先生,他从70年代以来,即长期做西北出土汉简的整理与研究。当时关注简牍的学者很少,我们一些同事暗中就有些讥笑,说谢先生就懂那些简,意思是别的都不懂。当时利用简的学者也很少,除了谢先生之外,大多数同事都不用。到了90年代末,郭店简的出土和张家山简的公布之后,风起云涌,很多人都开始重视简牍,简牍研究经历了从冷到热的转变过程。现在从事战国秦汉史的研究,如果不用简,就成为outer了,大家会嘲笑。好多以前没摸过简的人,也开始用了,对简也做了专门研究,这中间有个冷热的变化。

但即使是在热潮中,也还是有冷热的不均匀。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很多墓葬里出土的简,有很多典籍,《老子》、儒家经典,更受大家关注,研究非常非常多。我们看一下简帛网、简帛研究网上的文章,关于典籍简的研究,就非常清楚了。有的博士论文,专门写简的某一篇,如《容成氏》,他把前人的研究收集全了,然后自己再去研究,成就一篇博士论文。这个很受大家重视。但是相形之下,数量更多的行政文书简则很受冷落。去年到今年,公布了很多,《走马楼竹简四》公布了六千多枚,肩水金关的简也公布了两千多枚,但这些简公布之后,关注的人其实寥寥无几,留意的学者并不多,也没有人专门开会讨论它,研究文章也较少。当然,里耶秦简是一个例外,前段时间在武汉大学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因为秦代情况比较特殊,它是第一个大一统帝国,传世文献的记载却寡少,所以虽然里耶秦简只是一个偏僻的县里的文书,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从1999年以来,罗新和我参与发起北京吴简读书班,前几年很活跃,但最近两年较少活动,大家写的文章也不多。总的说来,以典籍文献为中心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行政文书简则相对受冷落。

简牍研究以典籍文献为中心,与行政文书为中心的研究,这两种研究取向的差别,是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延伸。这种轻重之别历史之悠久,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晚近的例子,敦煌遗书发现,中国与日本的重视方面就不同,王重民、向达与那波利贞都到巴黎去看卷子,但各自的关注点不同。王重民关注敦煌文书中的四库典籍,搜集传世文献的抄本以及遗失的典籍文献。那波利贞则关注其中的社会经济文书,如契约、社邑文书等等。这也是重视典籍和文书的差别。又如清末的八千麻袋档案事件,大家都很清楚,传统的学术界,像张之洞这些人,其实都不太懂档案文书有什么用;像罗振玉这些人,有新的史料观,才会重视档案材料。当然,这也不仅仅是近代的情形,再往上追,甚至可以追到汉代。根据阎老师的研究,儒生主要是饱读经书,而文吏则大多埋首文书之中,前者是很看不起、排斥后者的。饱读经书的儒生与埋首簿册的文吏的对立,从汉代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

这种冷热之间的变化与对立,既有我们传统学术架构上的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学术理念的对立:典籍简背后是思想史、学术史与文化史、法制史的兴起和受重视。相比之下,法制以外的制度史,除在个别学校受重视外,其实做的人并不多。另外一个领域是经济史,经济史在世界范围内衰落,在中国做的人也非常少。出土文献中大量的史料,与制度史、经济史都有密切的关系。但其实在史学研究中,政治史和制度史、经济史还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各种不同领域的兴衰。我以前做的研究,一般归结为社会史。近年来,我感到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权力,所以将重心转向制度史和政治史。今年六月,去史语所开会,杜正胜先生感慨,1990年代初提出新社会史,走过了很多年,还是觉得

政治史最为重要。所以需要重新反思不同学科领域的兴衰。比如吴简中有大量吏民田家籍,记载历史上每家每户耕种的土地数量,在过去研究土地所有制、经济史,大家都会很重视。但现在关心的人寥寥无几。吴简出来了之后,比较关注它的,都是以前做经济史的老一辈学者,像高敏先生、黎虎先生、杨际平先生等。经济史中的很多问题,像以前比较关注的所有制问题,年轻人很少关注了。

研究的转向并不代表问题解决,更多的是厌倦和回避,背后的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像土地所有制等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需要新的思考角度,提出新的问题。

2. 具体研究上如何处理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的关系?

这里面大家常说的一个表达就是“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先生的表述,是讲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互释证”,“相互释证”是两方面相互之间的解释与证明,两方面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陆扬先生在给罗新、叶炜合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写的书评里,讲“墓志作为一种独立而不孤立的资料”,其实,出土简牍文书也有着独立的价值,但不能孤立地使用,需要充分把握各种资料的特点。简牍在缀合、册书复原基础上,归纳其中的词语含义,概括具体制度的实态,再去和文献相关的论述对照,揭示异同,不能因某些词语上的貌似一致或制度上的相关,而简单地将两者拉郎配式地联系起来。最近读过若干利用出土文书或律令简牍的论文,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有人会把文献中与简牍中出现的同样的字,不论其时空上存在的巨大差别,有时候会差上几百年,地域上也有很大差别,就简单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当时看或者还能说得通,但随着更多简牍资料的出土与公布,再去归纳,就发现了问题。这一方面是急躁,另一方面是将二重证据法简单地理解为以出土资料补充或证明传世文献,这一点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简牍有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说补史的话,补充的是历史,而非仅仅是传世的史书或文献。简牍揭示出很多历史上没有记载下来,或是消失了的侧面。需要以出土文书简牍为主体,在这基础之上归纳,去补充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这方面其实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如果以传世文献为中心,仅仅使用出土文献去“补”的话,其实会忽视掉很多出土文献本身所保留的大量信息。

将出土文书简牍作为一种独立而不孤立的资料,特别需要注意其存在的形态,产生的过程,属于日本学者所说的“文书学”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本来一直没有这个传统,现在已经开始召开这样的会,强调对这些资料特点的重视,进行归纳。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出土行政文书的跨断代研究:观察历史演进的另一只眼

出土文献资料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间性,它基本上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时间上也往往是特定的某一个时段,所反映的一般是历史中某一个局部的现象。研究中往往容易局限于某一个断代,出土文书也很容易与断代研究相结合。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出土文献需要做跨时段跨断代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长时段历史演进的另一只眼。如同类简牍,从里耶秦简开始,就有大量的仓库里出米的文书,居延简、敦煌简(廩给文书)、楼兰文书、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吐鲁番文书中均有性质相同的资料。这些类似的出土文书可以放在一起前后比较,看出制度的变化,看到制度变化背后的人的力量,了解历史发展长期性的变化。我们看早期的里耶简,给一个人,这个人无论是隶臣、隶妾,出一个人的米,都要有三个官吏

在场,一个人是出的,两个人是看的,还有人要写。后来慢慢发展,用的官吏越来越少,官吏在简化。从这里看,秦代的官僚帝国可能达到了最高峰,它的很多制度最严厉、细密,也最复杂,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地简化了。官吏们日常的抵抗、懈怠,消磨了制度的效率,后来变得越来越简单,到了唐代,与秦代比起来,已经简化了很多。这在出土文献中,可以进行相同制度的跨时代的比较分析,可以超越我们断代的限制,看到某些长期性的变化,帮助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除了廪给制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国家的日常统治。传统的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相对集中于上层和帝王将相的精英政治,但在此之外,国家的运转是基于日常的统治,对于这一方面,大量的行政文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如果我们能从这个新的角度展开研究,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古代国家形态和运转机制。

罗新:侯旭东教授就他有关出土文献的研究的思考做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有学术史意义的总结与反思。一百年来,学术界都一直重视出土文献,可是重视的内容很不均衡,研究的问题也是有冷有热。侯旭东先生通过对简牍研究的冷与热的观察,来看这些年来学术研究的重心的变化。侯旭东先生自己也走过了这样的道路。他最初利用造像碑铭,来研究中古早期北方民众的信仰与生活;后来兴趣点转移到简牍方面,先从吴简入手,渐次扩展到秦汉简,近年来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对简牍本身做了一些思考。

我自己也参与到简牍特别是吴简的整理与研究,当然取得的成绩不多。我们过去做简牍研究,主要关注对简牍中的某些概念或词汇进行诠释或解释,或者是将简中记载的某件事与我们已知的历史知识进行对接。比如将吴简与《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接,然后进行研究。这是过去十几年来吴简研究的主要模式,大量的文章都是这种类型。近几年来,以侯旭东老师为代表,还有另外一些年轻的学者,开始对吴简进行文书学的研究:将吴简作为一种“独立而不孤立的”文献,就是要把它当作一种独立文献来对待,它自身就有价值,而不是对这里面的东西作一种新的解释或者把它与固有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它才有价值,而是强调它自身的价值,探讨吴简的原始形态、内在结构性的东西。这种研究是近几年来最有特色、最为深入的,也最有前途的,侯旭东先生作了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这个工作当然还在比较早期的阶段,很有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当然,侯旭东先生作为一种进一步的反思,通过读文献,观察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与我们此前很多年的研究有较大差别。

魏斌:我也做一点简的工作。我自己做的工作,主要偏重在社会史的重构方面。现在关于简牍的研究,一个方面,是通过简里面的制度等,与传世文献对接的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简牍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历史问题。我自己比较关心的,是简所告诉我们的有关地方社会的信息。我在武大,这两年和一些比我更年轻的学者,组织一个研讨会,去讨论华中区域的社会变迁,时段拉得比较长,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去讨论从周代南土华夏国家向南方地区的推进。南方出的简牍,主要集中在湖北和湖南,湖北的简以典籍简为主,湖南简基本上都是文书。湖南这个区域,在汉晋时代的文化接触史上,有怎样的社会史意义,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我这些年的工作,就是试图从简牍所提示的信息中去重构汉晋时期南方史的一些断面。虽然简主要以官府的记录为主,但是还是能为我们提供一些以前研究者所不大注意的线索。

从战国楚简到秦简,西汉、东汉,一直到吴简、西晋简,在湖南地区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地理剖面。如果能够跨断代地将这些剖面予以揭示,重构早期南方社会史将成为可能。这个

工作非常难,所以进展不是很顺利。自己的语言训练不足。我一直不能确定,研究中古南方的历史,是不是需要对历史时期南方族群的语言有所掌握之后,才能开展?如果我们不能掌握他们的语言,对他们的了解就不够真切,我们还是站在一个汉人的立场上来研究他们。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通过一些人名的分析,来看早期的编户问题。文章中提出一个概念:边缘的强化。在湖南,即当时边缘地带,政府推行的是一种比中原地区更为严整的制度。因为边缘地带的制度是在后来形成的,在有些时候,会比中原地带更为整齐。来之前刚写完一篇文章,利用张家界出的一批残简,探讨东汉前期的武陵蛮问题。

这些年,我也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田野在哪里?我们去做田野应该去看什么?今年年初的一次田野调查给我很大启发。我陪着佐川英治去看里耶秦简博物馆。博物馆与古城一天就看完了,我就提议去看湘西的山川地理、土司的遗址,沿着酉水走一遍。沿着酉水下来,转到沅水,绕到澧水,回到张家界。我发现对原来在《后汉书·南蛮传》里所看到的那些信息的认识有些不同。我最近能够写那篇文章,也是拜那次考察所赐。对于中古史的学者来说,有些东西是消失了,但有些东西是依然存在的。比如山水的形势,一些重要据点上的屯戍点,其实变化不是很大。我有一个模糊的看法:在早期南方的山区,人的生计形态从古到明清大概没有太大的变化。对“民族大移动”的说法我有点怀疑,在这一地区的土著人群没有太大的迁移,比如苗族传说中的大迁移,其实是一个同化过程,在同化过程中边界形成了,感觉好像是移动了。我认为中古史的田野还是很有前途的,与明清史的田野有很大的不同,但仍在思考中古史的田野要怎样找到一套真正有效的方法?明清史学者的做法与我们中古史研究确实离得有些远。

最近武汉大学将出一本论文集《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收录19篇论文,时段拉得比较长,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代。分成几个组,其中有一个组,即专门使用简牍研究地方社会。我希望能够利用武大历史研究在时段上的完整性,完成从战国到明清的南方史的长时段重构。但仍在思考和探寻:我们的方法的特殊性在哪儿?这样做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效果?我现在也还不是特别明确。

鲁西奇:我自己没有做过简牍的研究,所做的买地券整理与研究,汉代的几种,或者可以归入简的内涵。我想,侯旭东先生今天所谈到的文书学的理路与方法,或者可以追溯到汉简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去。我们知道沙畹(Edward Chavannes)最初对斯坦因探险所得汉晋简的整理,基本上是按简牍的出土地点对简牍进行排列的,他其实在努力将简牍与其所出土地方的政治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当然,他这个工作还只是起步。罗振玉、王国维作《流沙坠简》,罗的重心是那些小学术数方技书,而王国维则侧重于屯戍丛残和简牍遗文的考证辨析,在考证过程中,不仅是与传世文献相比照,也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当地的情形。至于劳榦先生,则主要是运用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比照,研究若干制度与史实问题。所以,简牍研究的几位早期学者,其实即已显示出了不同的学术取向:虽然不太准确,但我揣测沙畹与王国维的部分取向是侧重于简牍的地方意义的,即试图使用简牍材料,来探究其出土地方的社会与历史进程的,它当然也可以归入侯旭东教授所讲的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罗振玉的取向,基本上可以界定为侯旭东教授所说的典籍简研究;而劳榦先生则大抵主要是运用简牍与传世文献互证,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简牍研究的主流。而无论是沙畹,还是罗、王、劳,都存在对简牍的分类与研究,这应当就是较早的汉简文书学吧。我想后来鲁惟一、永田英正的研究,大概也都属于文书学的尝试。当然,这些学者可能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应

当把简牍看成独立而不孤立的资料。

记得陈梦家先生在《汉简缀述》的第一篇导言部分曾经提出:汉简的研究不仅是排比事类,与文献相比勘,或者考订某些词、字或片断的历史事件,而需要注意简牍的出土地点,即遗址的布局、建筑构造以及它们在汉代地理上的位置。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简牍研究的“在地化”问题,但已经很接近了。他其实已经在批评简单地将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比照以研究相关史事、制度的做法,也暗示简牍材料的相对独立性。

把简牍材料视作一种独立而不孤立的文献资料,其实是与简牍研究的“在地化”相一致的。正如侯旭东先生刚才谈到的,简牍资料大都有其特定的时、空限定,反映的往往是某一特定时段内某一特定地域的历史发展与社会情形。因此,简牍材料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地方性。而它的“不孤立”,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它与其所处时代全国性要素之间的联系。所以,我理解把出土文献看作“独立而不孤立”的材料,就是要把它当作特定地域范围内、特定时间段里部分历史过程与事实的反映,主要依靠其本身的内容,研究其所反映的地域社会的各面相;同时,又将它放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全国)与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国历史)里去把握。

因此,我赞同魏斌刚才谈到的研究理路。我曾经设想,把湖北云梦、江陵等地所出的秦汉简,诸如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岳山秦简、扬家山秦简、王家台秦简、周家台秦简、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汉简、江陵高台汉简等材料,汇集在一起,去做一个楚国东迁(前278年)至景帝时代大约150年间,南郡地区的编年史。材料基本上是够的,而且因为传世文献中关于这一地区楚、秦、汉之际史事的记载非常之少,也迫使我们不得不主要依靠出土文献去重建其历史叙述,从而得以保持其材料与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如果能做出来,一定可以展现出一个更为具体而生动的汉代地域社会景象。可是,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总之,我的意见是,或许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出土简牍的“在地化”问题,把简牍对应或还原到它所产生的地域社会中去,通过简牍去研究地方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

张侃: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者们,在解读科仪本、碑刻、族谱、契约这些独立的文类的时候,更加关注文类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从文本社会学的角度,去关注一种文类的表述在时间段和空间段上的异同。比如明清时期闽北契约文书的地方性的表述能不能在上古时期的行政文书中得到体现?行政文书包含了很多国家化的叙述,能不能看到地域社会的层面?不仅仅是国家制度中的户籍、财税、军队等等,还有没有更底层的土著的生活?从文献的表达和话语中,能不能看到上古时期正统王朝关注之外的人群?除了观察文献所表达的人群之外,去寻找谁没有被表达,为什么被掩盖而没有被表达?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更深刻的社会意涵可以被重视?这些问题可能可以成为明清史和上古史共同去思考和交流的问题。

饶伟新:近年来,不单是中古史,就是明清史,对政治史与制度史的研究也有一个转向,即所谓新政治史和新制度史,不再过分关注制度的本身,逐步转向于制度的日常运作,实际不就是讨论政治过程。在明清史领域,把政治史做活、把制度史做新,就在于与日常生活史、社会史的结合。侯老师以前主要做社会史,现在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史,可能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政治史不过简单的帝王将相的历史,不是那么简单僵化,而是具体的运作;而这种政治运作是在社会层面上、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

我自己的研究是江西南部(赣南)地区明清社会史,近几年关注明清时期赣南区域的军

户、卫所的研究。前人主要关注于军户、卫所的官方制度,主要是在制度史层面上展开的,在这方面,“中央研究院”的于志嘉老师做得非常好。那么,在民间的层面,在民间文献中,所得到的信息,其实是远远超过官方文献的,很多东西是官方文献中看不到的。而最近几年的研究开始走向田野,在田野里看到这些制度的实际运作。透过田野搜集的民间文献可以与主要立足于对官方文献而形成的制度史,形成新的认识和看法。但运用这样的研究方式,我也产生了一个困惑,即当我们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实际上通过别的途径,也可能展开探讨,并得出基本上相同的认识。那么,怎样透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去反思明清史中的基本问题?这些具体的区域个案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如何处理文献和文献,以及文献和田野的关系?侯老师提到对“二重证据法”的理解问题。明清史很早就重视民间文献。自从傅衣凌先生开始,厦大的史学研究就开始注重搜集民间文献,去补充官方文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二重证据法”。当然,民间文献不仅仅是对官方文献的补充,或是两种文献的互为补充,更重要的是关注民间文献本身的独立性,从民间文献本身去提出一些新的课题和思考。所以,“二重证据法”其实不仅仅意味着将民间文献与官方文献相比证,更意味着民间文献本身是独立的资料,它带来了很多官方文献没有的信息,也提出了诸多新的问题,因而迫使我们进行新的思考。

文献不仅会带来信息,也会伴随一些陷阱和欺骗,不小心,就会上当,随着文献走。因此,应对文献进行多层次的解读。第一层是现代的人怎么看这个文献;第二层是当时书写的人与这个文献的关系;第三层更为重要,是文献所产生的时代、社会与文献的关系。其中,精英意识,即书写文献的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最多的陷阱。历史学家应该怎样从现代到近代,到明清,到中古,去了解文献,去理解文献背后深刻的历史内涵,更为真实的反映文献对当时的意义以及它们所涵盖的历史的深度?

程美宝:刚才几位先生都谈到文献自身的价值,我的理解还主要是指文字所表达或蕴含的信息。那么,如何理解简牍这种形态本身的价值?行政文书或官僚文书,对于官僚体制是很重要的,但是文书本身是有一个上行下达流通的过程。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出土的简牍文书,在当时究竟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是被记录了放在一旁呢?还是真的有流转的作用?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在教“传媒社会史”课程时,受到加拿大传媒学派的代表人物 White Owen 的启发,他基本上要把整个人类的传媒史讲通,但他所用的主要是西方的文献。他所说的论点及依据的材料其实都是西方文书学的问题,比如官僚文书的问题,他讲到莎草纸为什么会订成一本本,是因为罗马帝国时为了收税,所以就有一个本子拿着去用。媒体就是信息的大前提,这使我们去思考:同样的内容存在于怎样的载体,这个载体自身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关注简牍是如何用的?

历史研究很容易受到书写文字的人的误导,认为社会的统治或是制度的运作看到相关的文献就可以被了解。但是,即使是在今天的乡村还有很多人不识字,很多运作也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去运作的。那么在遥远的古代,这样一种数量不多、使用范围不广的文字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它的价值究竟何在?它可能超越我们今天能够读出来的信息。

我们是否需要懂得所研究对象人群的语言文字,才能研究他们?这是一个文、言分离的

问题。我们看那些简牍的文字,究竟有多大程度能够反映当时的人是怎样讲话?文,形成一种怎样的结构?“文字是一种迷信”,文字成为一种象征,百姓依赖于掌握文字的人,因此,文书所记载的内容只是历史的一个很小的层面。在文、言分离的社会中,文书所包含的作用可能会偏离或超越我们从文字阅读中所得到的信息。文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人们是怎样讲话的?

尽管大家都说我们要去做一个本土或是土著自身历史,但是我们去表达这个方位的时候,我们还是一种中华帝国的中心论,比如这里是西北,那里是边陲。但是在某个地区发掘出的材料,究竟和我们所理解的中央的政治有怎样的关系?

温春来:做明清史的学者,很早就开始使用族谱、契约等民间文献,但在使用过程中,却很少去考虑这些文献是否具有独立性的问题。不是不考虑,而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档案、契约、族谱等,反映了一个不同层面的历史,这个历史,与正史等文献中反映出来的历史是不同的,但不是完全无关的。我们希望把从不同材料中看到的历史,组织成一个具有整体感的或者说立体的认识。我们没有想到过“二重证据法”,因为它已经完全不能概括我们在民间文献中所看到的那些东西。没有那些制度史的资料作基础,这些民间文献也不能理清楚。

怎样做田野的问题,一个是观察自然环境,一个是建立不同的时空体系的对照。我们做明清史,也经常跑不同的地方。通过对自己研究区域外的其他地区的田野,建立空间上的对照系,可以加深对所研究区域的理解。通过不同朝代、不同时间段的对比,建立时间上的对照系,可以加深对所研究时段的理解。田野的意义,对于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事项而言,可能是不同的。当我观察一个村庄,看那些人怎样展开自己的生活、组织自己的社会,对我来说,就会受到启发。历史学之所以能够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历史背后人性的某些东西是相通的,否则就没有办法研究历史了。我们或者可以用现在的观察所得,来同样地处理中古史研究所处理的那些材料。

王献华:出土资料在性质上和其他资料是一样的,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出土文献的独立性,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问题是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在我们试图理论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理论其实是无法超越我们的实践的。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理论往往是无法精确的描述我们的实践的。因此,在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不应过分地强调理论,以免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束缚。在处理古代文献时,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使用这些材料可以讨论哪些大的问题,而是依据这些材料,我们至多能够讨论、认识哪些问题,它的边界在哪里。

罗新:我解释一下所谓“出土文献的独立性”问题。不是孤立的,很容易理解;出土文献的独立性,是有特指的,不是说我们尊重独立文献,不把它看作附属的,而是说出土文书本身,这是应当是什么形式的,它在当时的普遍形式是什么,它应该怎么写,它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或格式,哪一个字在前面或后面,哪一个词怎么使用,这个格式本身是值得恢复的、值得研究的。当然资料很少,找到有限的材料,我们试图去恢复它本来的面貌。这个工作本身当然很难,其意义现在也还并不完全明了。

陆扬:侯旭东老师刚才提到我在给罗新、叶炜著作写的书评里,所说“文献的独立性”问题。文献的独立性,涉及的是如何去界定这一文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的某一层面,如程美宝老师说的物质性的载体。物质性的载体可以使我们了解某一种文献在当时的功能,以及它在多大层面上可以影响到当时的社会或行政。另一方面,是指文字本身的

表述。这与西洋史中讲档案的情况是一样的,比如戴维斯的《档案中的虚构》中,讲档案有一个特殊的写作方式,那种写作方式也就界定了档案本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表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的话,就会认为文献会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但实际上它是一套历史写作和操作的手法。这些写作手法当然可以保证写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但因为他必须遵循这种写作手法,就不可避免地整合他所面对的历史事实与材料,使之符合写作手法的表达需要。如中古时代的墓志,有一套具体的操作手法。如果你了解这些操作手法,就可以比较精确地把握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而不是仅仅看到这些文字,就认为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或者认为它不过是一些虚夸的表述。这两种认识都是不足取的。因此,了解每种文献的形式和表达,也有助于我们比较精确的把握文献的真实信息。

程美宝老师提到的文字有效性的问题。对文字的有效性的怀疑,越往近现代,这种怀疑的成分越重。这当然与材料的多少是有关系的。从古代史的角度来说,也许古代的人,对掌握文字的人的信任度,与后代不太相同。因为有很多证据表明:虽然掌握文字的人很少,但他们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小。当然,可能有通过非文字的手法去进行沟通的情况,但人们对文字的信任度可能并不低。

谢湜:出土文献为什么可以成为一种可供讨论的对象?大概历史学家都有一种强迫症,认为出土的文献更可靠些。但仔细想一些,这些出土文献为什么会留存下来?黄山书店出版了十本,包括了唐代到明清时期的几百种官箴书。我在阅读这些官箴书时发现,从武则天定的《臣轨》,到宋代的《州县提纲》,到明清时期众多的官箴书,在很多地方行政的方面,一些理念和做法,并没有很大的改变。某些行政文书并非局限于特定时空中,而是存在于中国官僚制度的长时间延续的传统之内。所以,利用行政文书进行地域性研究,需要不断代的学者进行不同时空维度的比较,这样就不会认为自己所研究的文书只是特定时代的问题。现在做简牍的学者比较重视较早的东西,作唐宋史的学者比较重视文书的传递,而做明清史的学者则比较重视地方性的档案,这些东西,如果把它看成是某种具有时代特性的东西,可能要非常小心,它们可能更具有超出特定时代特质的一致性。

怎样从文书中去看到当时社会的大多数人?还是从文书中只能看到少数人?我们在江南的田野研究中,发现晚清、民国地方官员所立的大量告示碑刻,如禁止滥采滥伐之类。这类文书是当时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写了这种东西,去对付另一批人,是当时使用文字的人与不识字民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因此,怎样从这类行政文书去看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侯旭东:鲁西奇先生提到陈梦家先生的文章。那篇文章大概是1963年写的。他从事简的研究不过五六年的时间,但却超越了劳榦先生。劳先生做了一辈子居延汉简,但他的贡献没有陈梦家几年的贡献大,关键在于陈先生找到了方法。这篇文章,在前面两页,就把方法概括出来了。陈先生原来作甲骨文,根本就没有多少传世文献,所以他特别重视甲骨文自身的特点。他把这种方法用在汉简研究上,所以很快就摸出了路径。把握材料的特殊性,非常重要。劳先生基本上还是在补史记史的路子上去做,所以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发现它的价值。

传世文献中其实有很大陷阱,反映的是当时儒生的理想,或者是将正反两面的榜样人物纳入史书,流传下来,而忽视历史中最常态的内容。出土文献,表现了一些常态化的东西,虽